



# 开展对中国南方古代青铜器研究的若干思考



彭适凡

(江西省博物馆)

璀璨夺目的古代青铜器,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特征,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方青铜器又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南方地区,本应包括长江上游地区的整个长江流域,但考虑到长江上游古属巴蜀文化区系,而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古属越文化系统,在古代青铜文化面貌上虽不完全相同,但又表现出诸多共性,故此,本文所指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包括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也就是东周时期开始称谓的“百越”地区,即所谓“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语)

—

长期以来,广袤的南方地区,在旧史家的笔下多被描绘成所谓“荒蛮服地”。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南方各地重大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这就不能不向传统的观念提出严峻挑战。正如有的学者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的确,较长一个时期来,海内外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限于中原青铜器,而对于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的青铜器却甚少综合研究。以中国南方地区为例,过去的研究基本是空白,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出土青铜器较少,且多是零星的分散出土,加之又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即或有的是南方地区出土的,也都认为是从中原带过去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南方各省区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商王朝中心以外的非

中原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不仅商周文化遗址(含矿冶遗存)不断被发现,青铜器出土也日趋增多,如湖南商周青铜器群、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青铜器群就是其中突出的实例。这些重要发现,大大丰富了南方青铜文化内涵,自然也引起了海内外青铜器研究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1992年8月由已故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倡导和组织的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就是一个标志。出席会议的除国内一些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外,还有台湾、香港以及美、英、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大家就长江中下游吴越地区青铜器的时代、性质、特点及其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可说是有史以来首次召开的有关南方青铜器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无疑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年后,即1993年8月,江西省文化厅、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江西省文物局、江西省博物馆等单位又联合发起召开了“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美、日、英、瑞典以及香港、台湾和国内学者共115人,提交大会学术论文82篇。其与会代表之多、学者之广泛和会议规模之大以及学术讨论气氛之热烈都是空前的,充分表明海内外学术界对南方青铜器研究的极大热情和浓厚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初,2001年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带来了不少考古新材料,并从多视角、多领域、多学科出发,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长江流域

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文化特征、各区域间的文化异同及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正如李伯谦先生在会议总结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应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立“中国商周时代南方青铜器艺术研究”课题组,并与日本等国的学者合作收集编就了“中国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研究文献目录”(稿本)。从这些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研讨会上所对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足以表明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在大量考古新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长江流域出土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除有的发表了宏观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外,施劲松博士在张长寿先生指导下,于2004年出版了《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专著,这是迄今所知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第一部著作,不仅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而且已初步建立起有关南方青铜器的产生、发展框架和断代标尺,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对南方青铜器的研究。

## 二

从前述几次学术讨论会和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学术界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诸如南方青铜器的特点、文化面貌、性质、年代乃至工艺技术等都有不同的认识,而其中最主要也最关键的是铜器的断代问题。因为对南方出土青铜器的年代认识不一,就必然导致对南方青铜文化产生绝然不同的理解,对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历程等问题自然也产生不同的认识。正如马承源先生所指出:“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首位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些器物铸造的时代,时代解决了,才能放在其应有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如对皖南屯溪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断代,一种意见认为其年代应为春秋早期或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这可以马承源、陈佩芬、李国梁等先生观点为代表;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其年代为西周早、中期,这可以李学勤、李伯谦、张长寿等先生意见为代表。再如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断代,则分歧更大,

目前主要有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期、殷墟早期偏晚阶段(稍早于妇好墓)、商代后期早段即殷墟早中期(相当吴城二期)、殷墟晚期、商末周初<sup>①</sup>、西周中期后半段<sup>②</sup>和春秋早期<sup>③</sup>诸说。众说中,主张最早和最晚的年代竟相差近千年。由于对这批青铜器群的断代不一,自然对新干大墓(或遗存)的埋葬年代也各持其说,即主张商代墓葬说,或春秋遗存说等等,足见青铜器断代研究的重要性。

对南方出土青铜器的断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这首先是和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自身的复杂情况有关。它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原青铜器几乎都出于商周时期的大小墓葬和相关遗址甚或都邑遗存中,不仅大都有明确的地层迭压关系,还多伴出有共存的陶器、原始瓷、玉器和漆器等遗物,甚至不少青铜器上还带有可供断代研究的铭文。而南方青铜器则恰恰相反,一般多是单个零星出土,既无地层迭压关系,又无陶瓷器或其他遗物伴出,此其一;其二,即便是出自窖藏或墓葬或祭祀坑,虽也伴出有陶器等共存物,但又由于其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纹饰完全和中原一致的中原型青铜器,又有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土著型青铜器,而且一个窖藏或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往往时代不一,既有偏早的,又有较晚的,这在新干大墓的青铜器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该墓葬中不仅青铜器种类较多,内涵复杂,同时,既有商代中期二里岗上层期的青铜器,又有相当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早期过渡期的青铜器,还有商代晚期甚或近似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其三,南方各地出土青铜器的本身,大多数都隐含有不同程度的地域特色,有的青铜器的型制甚或纹饰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就从未发现过,而且几乎都没有铭文,因此,它无法与中原及其他已出土的青铜器相比较,也难以确定一个可供断代的准确的标尺。上述一些南方青铜器的自身特性,无疑给我们的研究首先是断代研究带来相当大难度。

其次,南方青铜器在断代研究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程度上依然受到一定传统观念的束缚,受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上中原中心论的影响,总认为“荒蛮服地”的南方文明一定要比中原文明落后。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博士把四川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断在春秋早、中期就是最好的代表<sup>④</sup>。他的理论依据就是所谓“文化滞后”论。诚然,在古代各种

考古学文化相互发展过程中,“文化滞后”的现象确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当传播主体的某些文化因素经过中介地区(或称藩属地区)传播到受体,其间不仅地域空间上产生位移,时间上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在传播受体发现有与传播主体的某些文化因素相同或相似时,其实际年代要相对较晚,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滞后”现象。但这里所讲实际年代要晚,是长还是短?是不是一定就很晚很晚,甚至晚到数百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李伯谦先生指出的:“无论多么正确的理论方法也有一个如何正确运用的问题,如果不能将正确的理论方法与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把它当作万能的法宝到处套用,也往往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sup>⑤</sup>。李学勤先生通过北京琉璃河西周铜器群等研究后多次指出:“中原文化因素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过程。从已有可判别的材料看,当时这种传播是相当迅速的。中原以外的青铜器,如其形制、纹饰都与中原类同,制作年代相差不会很远”<sup>⑥</sup>。何况,现在我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每期的时间跨度都较长,因此相比之下这一时间差根本算不了什么。在考古学文化传播模式理论研究中,除“文化滞后”论外,有的学者还提出过“文化因素在受体中的历史沉淀性”概念<sup>⑦</sup>,所谓“沉淀性”实际也是“文化滞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传播受体在接受了传播主体的某些文化因素后,已作为自己的文化因素被保留下来,甚至当这些文化因素在传播主体(或称传播源)可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它仍被继续保留。这种情况在考古学文化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在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有反映,如长江下游西周早中期常出土的那种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尊和卣,以后在装饰作风上虽不断有些变化,但从这种基本器型来说一直延用到春秋晚期到战国,而在中原地区,西周中期以后就不见了。但是,如同“文化滞后”论一样,在分析“文化因素在受体中的历史沉淀性”时,也有一个如何正确运用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日本林已奈夫教授通过对新干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比较,认为最晚的青铜器应是西周中期,他也承认新干大洋洲遗存中确有不少商代后期早期阶段的青铜器,但这是“由于该制作传统自商代后期早期阶段到西周中期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在当地得到维系继承的结果”<sup>⑧</sup>。林已奈夫教授还通过对新干出土陶器与

中原陶器比较,承认吴城文化陶器和中原商殷文化有一定关系,新干大洋洲的陶器群属于吴城文化二期也没问题,但却认为,不论吴城还是大洋洲的陶器,如同青铜器一样,“要考虑旧传统长期延续的问题”,这就是说,尽管吴城、大洋洲的某些陶器与中原商殷文化相同或相似,但并不表明它们是处于同一时代,只能说明赣鄱地区的后一时期的居民在陶器烧制上也模仿数百年前中原殷商陶器的烧造,即吴城和新干的某些陶器系仿古陶器。这种用“文化滞后”或“文化因素在受体中的历史沉淀性”理论,将吴城文化和新干青铜器群的年代断定在西周中期乃至以后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第三,南方青铜器断代研究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尽相同。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必然产生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论。

较常运用的一种方法是将一坑、一墓出土的青铜器和同一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将其放到所处南方地区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编年序列中去研究,而且强调与青铜器伴出的其他遗物特别是陶器在断代中的重要作用。以皖南屯溪土墩墓青铜器群的断代为例,因为这批青铜器是出自土墩墓,而土墩墓又是两周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土著民族葬俗,故此有学者先从土墩墓研究入手,对皖南及宁镇地区土墩墓通过地层学、器型学等考古学方法进行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然后将屯溪各土墩墓一一分别对座,最后排出有青铜器群的几座墓当为西周早、中期,有的排为西周后期,那墓中青铜器群的年代自然就应为西周早、中期或后期物<sup>⑨</sup>。在进行考古学分期排队中,伴出的陶瓷(原始瓷)器是最主要的依据。有的仅通过对屯溪土墩墓中出土大量几何形印纹陶器和原始瓷的器类、器形和印纹陶的种类和装饰作风分析,就认为和苏南地区西周早、中期的印纹陶瓷器风格一致,而与苏南乃至长江下游地区东周时期土墩墓、土坑墓甚或石室墓出土的印纹陶瓷器明显有别,因此,屯溪土墩墓青铜器群的时代怎么也不可能晚至东周<sup>⑩</sup>。

又如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研究,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特别是陶瓷器(原始瓷器)的分析来看,其中有不少器类表现出与吴城文化的一些器类相同,如大量的颈腹有折度的带圈点装饰的联



裆鬲(带瘳裆)、小口折肩陶罐、深腹盆、硬陶高领折肩罐(有的称折肩尊)、高圈足浅盘弧腹豆(有的称真腹豆)、不带子口(《吴城》报告称 Ab 型)和微带子口(《吴城》报告称 Aa 型 式)的伞状器盖,特别是大量原始瓷和釉陶质的小口折肩罐、器盖以及大口折肩尊等都和吴城文化二期(最晚的因素可能到吴城文化三期早段)的同类器物相同,普遍带弦纹和圈点纹的装饰风格亦完全一样,因此,推定新干铜器群的年代只能和吴城文化的某一时段相当。近年来,江西考古学者开展了对新干大墓附近牛城城址的深入发掘和研究,证实了牛城的文化面貌既表现出与吴城文化有某些共性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证实了新干大墓与牛城城址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牛头城城址的年代跨度大致在殷商中期到西周早期,因此新干大墓的年代也应和这一地区大的文化背景相对应,也即不可能晚至西周中、晚期,更不可能晚至春秋。

另一种方法,是先从对青铜器本身的研究入手,对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然后多方面的对南方地区最常见的一类器类如尊、盘、匜、鼎和乐器句鑃、铙(或称钲)以及兵器等的特征进行广泛的横向比较,从中发现某些青铜器上的相同或相近因素,以此寻找年代线索和断代依据。如通过屯溪墓铜器群中的扁圆腹筒形尊与江苏丹徒、安徽寿县蔡侯墓的 16 2 尊甚至绍兴 306 号墓出土的尊相近,屯溪出土的龙纹外撇锥足鼎、四瓣目纹鼎和湖南长沙金井、资兴旧市等地的所谓越式鼎相似,屯溪的云纹簋和方座器与绍兴 306 号墓的一些器形也相似,再有屯溪出土的圆茎剑是春秋晚到战国早期大量铸铭剑的常见形式,等等,从而推定屯溪铜器群的时代只能是春秋中晚期。又如将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某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与长江下游土墩墓和湖南等地青铜器比较,认为新干的两件商代甗经改造加铸的断面呈半圆形不封闭的三足,其和江苏丹阳司徒砖瓦厂出土的 式鼎足、罐形鼎足最为近似,大洋洲青铜器上流行的燕尾纹与湖南长沙、资兴等地越式墓铜器上的燕尾纹有一定联系,特别是三件钲(即大铙)上的主体纹样,如带连珠纹为地的卷云纹、鼓部正中的卷云纹、边沿上的套连云纹都是典型土墩墓中某些铜器上的纹饰,因而大洋洲这部分铜器的年代应该和土墩墓、越式墓的年代相近。

当然,持上述两种不同方法的学者,在如何研究南方地区青铜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共识,如中原青铜器的发展演变序列清楚,研究南方青铜器应尽可能运用中原青铜器的研究成果,但又不能完全套用中原青铜器的年代标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墓葬等遗存单位铜器群的断代,往往有早有晚,那应以墓中出土时代最晚的器物,作为断定墓葬年代的依据,这是考古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马承源先生的这样一段话就较集中而精辟地表述了这种共识:“吴越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以中原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序列来套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原商周青铜器对于吴越诸国青铜器铸造工业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要从吴越青铜器大量考古资料的实际出发,作具体细致的排比研究,从各种现象中寻求合理的解释,得出真实的正确的结论。”

### 三

如前所述,由于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复杂情况,给南方青铜器的断代等研究带来较多困难,加以研究方法上的不尽一致,致使南方青铜器首先是断代研究上产生较大的分歧。在对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研究方法上,现在的条件、环境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不仅和宋代的金石学时的情况远不相同,就和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也大有变化,这就是近数十年来大量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有关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考古学、文物鉴定领域中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等等。所有这些新的情况,使我们对南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包括方法论的问题不能不作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首先,开展对南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现在决不能如同传统的研究方法一样,仅就青铜器研究青铜器,如同写诗一样“功夫在诗外”,既不能孤立地局限于青铜器本身的分类、型制、纹饰等方面的研究,还必须密切关注、重视和吸取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必须紧密地和已发现的众多商周青铜文化遗存的研究结合进行,必须把青铜“物”的研究和“史”的研究,甚至有的还要和铸造或使用或改造青铜器的“人”(古代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只有把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放到南方各地早期文明产生、发展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得出的相关问题的结论包括年代的推定,才有可能比较接近或基

本符合历史的真实。

以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包括皖南)来说,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青铜器就必须和这一地区已发现的商周青铜文化遗存结合进行。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在自身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进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后来又吸收和融合了北方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并受到山东的岳石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了点将台文化。该文化中至今虽尚未发现有青铜器,但在城头山、朝敦头遗址中却出土有青铜炼渣,这无疑表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萌芽,故有学者将点将台文化称之为宁镇地区青铜文明的萌生阶段,或称为次生的青铜文化,时代正好相当于中原夏王朝时期<sup>④</sup>。如果说点将台文化还不足以证明宁镇地区已跨入青铜时代的话,那么到湖熟文化早期阶段即夏商之际或商早期则应无可怀疑了,因这时的相关遗存中,已发现较多的小件青铜器、炼渣以及熔炼青铜的坩锅残片和陶勺等,表明这时的青铜冶铸技艺已广为使用。到湖熟文化的繁荣期即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至殷墟早期时,不仅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还出土有罍、爵、盃等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虽多仿自中原商殷器,但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地方特色。当殷墟中、晚期到西周早期时,湖熟文化已进入它的衰退期,出土青铜器随之也相对甚少。继湖熟文化之后兴起的是所谓吴文化,标志着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众多文化遗存和土墩墓的资料,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时代历经西周早期到春秋末年前后。上述宁镇地区从点将台文化到湖熟文化再到吴文化,表明该地区青铜文明的发生、发展、繁荣及至衰亡,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轨迹,它是以考古地层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大量文化遗存特别是像句容城头山和丹徒团山等典型遗址层位关系上而排比出来的,只是至今尚未发现有像赣江流域的吴城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那样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掌握了宁镇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衰退的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在该地区发现有商周时期青铜器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比之发达兴盛的中原地区无疑相对较少,而且对出土的青铜器,究竟是中原型还是仿照中原型铸造抑或土著地方型,都应一一具体分析。一概否认宁镇地区商周时期有自身铸造的青铜器,显然与考古学文化遗

存相违背,因而自然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其次,开展南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特别是断代的研究,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进行综合研究。我们不仅要对青铜器本身进行比较研究,还要对伴出的其他遗物予以研究,如果没有直接的伴出物,应尽可能从相关的文化遗存中寻找间接的可与之比较的相伴物。在相伴出土物中,陶器对铜器的断代又是数第一位的,因为陶器是广泛流行于人民大众中一种普通生活用器,有其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烙印,是断代的最好载体。

以屯溪一号土墩墓出土铜器的断代为例,墓中伴出陶器、原始瓷及几何印纹硬陶器不少,器类主要有瓮、罐、甗、坛、豆、盘、尊、钵、碗等,坛、罐一类器形特点是短卷沿,耸肩,最大径在腹上部,原始瓷多为罐、豆、碗、尊、盂之类,以原始瓷豆最多,器形又多为侈口或敞口、折腹或弧腹、喇叭形矮圈足,口沿下多贴附有双圆泥饼饰。常见纹饰有凸回字纹、曲折纹、云雷纹、变体兽面纹、叶脉纹和席纹等,且几何形纹样特征是印纹普遍粗深,刚劲有力,单位纹饰显得宽疏且大,具有明显的凸浮雕感<sup>⑤</sup>。所以,不论是从陶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的器类,还是其印纹陶纹样种类和装饰风格看,都与宁镇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如溧水宽广墩墓、句容浮山果园墓出土的陶瓷器大不相同,这时出土的陶瓷器主要有坛、罐、甗、钵、盆、盘、盂、碗等,屯溪土墩墓常见的喇叭形矮圈足瓷豆已大大减少,甚或不见,而被各种弧腹碗、折腹碗、盅式碗所替代。这时的几何形印纹陶纹饰广为盛行的是席纹、方格填线纹、菱形填线纹、套菱纹、米筛纹等,新出现波浪纹、锥刺纹和独具风格的辨形堆纹等,其纹饰种类和风格都与屯溪一号土墩墓伴出的陶瓷器明显有别,因此仅从陶瓷器的比较来看,说明屯溪土墩墓的年代应当比溧水宽广墩和句容浮山果园墓等的年代要早,当为西周早、中期,自然同出的青铜器最晚也应同时,而不可能晚到春秋早期。

又如2004年浙江省安吉高禹镇出土一件螺旋纹乳丁铙<sup>⑥</sup>,属阔腔型,甬部无旋,钲部36枚乳丁为螺旋状,乳丁间所饰云雷纹为阳纹,且基本为横向,但有的也与竖饰相连,隧部和鼓部无纹。类同的螺旋纹乳丁铙,在湖南湘乡金马寨等地都出土过,对这类螺旋状乳丁铙的年代,过去因它们几乎都是单个出土,因而只能从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排比来推

定。值得注意的是江西永修县燕坊乡四联村后山上也出土过两件青铜铙<sup>②</sup>，一为六边型腔云纹铙，一为合瓦型腔螺旋纹乳丁铙。前者与新干大墓出土的同类铙相同，后者则与浙江安吉高禹和湖南湘乡金马寨铙相类，都属螺旋状乳丁铙类。江西永修四联螺旋状乳丁铙不仅和云纹铙同出，更重要的是据考古学者在两件铙出土地点的现场清理发现，两件铜铙均出在村后西边山顶上一未经扰乱的圆形祭祀坑中，坑底部又有一小坑，其中出土有20余片商代印纹硬陶鬲、罐、尊等残片，印纹陶纹样有方格纹、云雷纹和席纹等，在紧临两件铜铙出土地点的西边丘陵上，经调查系一典型商代文化遗址，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采集到一批商代印纹硬陶罐、尊等残器，分别具有吴城文化和万年类型商代文化风格。这些伴出的几何印纹陶器，无疑应是推定铜铙年代的重要科学依据，周边的文化遗址与出土两件铜铙的祭祀坑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故此，我们推定永修四联螺旋纹铙的年代，最晚也当在商代末年，即殷墟四期，而不可能更晚。

除了陶器之外，如果还伴出有其他遗物如玉器、竹木器等也应一并比较研究，从中也可为铜器年代的推定提供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当出土的青铜器仅凭自身的造型或纹饰等特点一时难以断代时，或者是当青铜器成批出土，数量既多，种类繁多，年代又有早有晚，有的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又不甚明显令人难以断代的情况下，借鉴伴出的陶器和玉器等其他遗物的研究来断代则显得更为重要。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下限年代的确定就应该是这样。除陶器外，玉器也是一个断代的可靠载体。新干大墓出土的玉器饰品总计达754件（颗），其中有697件（颗）为绿松石镶嵌饰品和穿孔玉珠、玉管等，真正属于大件或完整者只25种计75件（串）。无论从这批玉器的类型（特别是礼器），抑或造型、纹样，乃至琢制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中原殷商文化的一致性，诸如璧、瑗、玦、琮、环、璜和戈、矛、铲以及装饰品中的柄形器、笄形器和圆勒等，都与中原殷商时期同类器相同；玉器上的装饰纹样如斜线纹、斜方格纹、菱形纹、回字纹、对角几何纹、莲瓣纹和带“臣”字目的兽面纹等，也是中原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玉器上常见的纹饰，甚至装饰的部位都很一致，如新干的玉璧、玉瑗，其孔周两面的凸起成环状圆口（有的称凸缘璧、凸缘

瑗）和两面饰同心圆刻线等特点均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式璧、式瑗相同。又如标本677玉琮和标本690圆形坠饰上所饰浅浮雕式变体卷云纹，即由圆圈纹构成的简体兽面纹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式玉琮的一件（标本997）上纹饰雷同<sup>③</sup>，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从玉器的器类和装饰纹样等分析比较来看，也说明新干大墓中出土的玉器明显具有殷商文化特点和风格，与长江下游、湘江流域甚至中原地区春秋墓葬出土的玉器完全迥异。也就是说，新干大墓中未发现有一件相同或接近于东周时期风格的玉器。因此，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下限年代要定到春秋时期，仅从伴出的玉器来看也确令人难以接受。

第三，开展南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即或是对青铜器本身的研究，也必须尽可能地做到要能高度准确地宏观把握和具有全局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必须将伴出的一组或一批青铜器作为整体来研究，都要进行比较分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应将共出的所有铜器都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并侧重于总体特征的比较，如铜器的组合、器形和纹饰的主要风格等，由此获得对年代的认识<sup>④</sup>。”切忌仅据一类铜器或一群铜器中的某种器物进行分析比较，更不能仅据铜器群中的某件器类造型或某件器物的一个方面特征甚或某种纹饰就推定该器甚或整群铜器的年代。以1976年浙江安吉县三官乡周家湾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与玉器为例<sup>⑤</sup>，其中青铜器8件，计有鼎一、觚二、爵一、案足四；玉器有器柄、环、璜、珠等。对于该批铜器，尽管是同时在一地出土，现暂且不论是否为墓葬还是窖藏，将每件青铜器和玉器都作具体逐件分析断代是对的，尤其在南方地区，不仅窖藏，就是墓葬中往往其出土物也非完全是同时性的，这就要具体分析。安吉铜器中的2件铜觚和1件铜爵，绝大部分学者都定为商晚期，因两件铜觚的圈足内出有一组族徽铭文。但是对那件鬲鼎的时代则分歧较大，有的定为商晚<sup>⑥</sup>，有的则断为春秋晚期<sup>⑦</sup>，年代差距竟如此之大。该鬲鼎，双立耳，束颈，鼓腹，分裆，三锥足外撇。器形颇为特别，袋腹似鬲，器足似鼎，有的又称分裆鼎。有的学者也认可其基本器形是按商代同类器设计，袋腹上的兽面纹也近同商晚的高浮雕状的兽面纹，就是束颈上的套连卷云纹和袋腹上所填卷云纹（地纹）非商代式样，而是吴越地区西周至东周时期青



铜器上的标准纹样,因而认定该鬲鼎应为春秋时越人刻意仿古之作。该器造型总体确是晚商风格,除鼎足有别外,其立耳、高束颈和袋腹分裆的基本造型与新干大墓出土的鬲鼎相同,前者为锥足且外撇,后者为实柱足,腹部的兽面纹都以高扉棱作鼻,但兽面纹的结构不同,后者作高浮雕的曲折角分解体兽面纹,但前者只有高浮雕的外卷角和“臣”字目,而无体,“臣”字目的下端作勾形,在角、目外侧又各饰一竖置的带勾“臣”字目,这为兽面纹中所罕见,很有地方特色。既然该器总的造型风格与晚商器相近,就因颈部和腹部的地纹而推延至东周,因而,具体深入地对这两种纹饰进行考古学观察就成为关键的关键了。

安吉鬲鼎束颈上的卷云纹是由两个卷云横向套连在一起,故称套连卷云纹较确切,只是这种卷云纹的两端或相套处多作歧状,腹部作地纹的是一种带圆弧状的云雷纹,转折处也往往有歧线伸出,而不是那种带直折角的云雷纹或勾连雷纹。这种套连卷云纹和云雷纹,和中原商周铜器上的同类纹不尽相同,而是中国南方地区古代铜器和其他器物上广为盛行的一种富有特色的装饰图案,它渊源甚古,且源远流长。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存中,如江西筑卫城遗址下层、广东石峡遗址下层和浙江丘城中层都发现有带漩涡纹的早期印纹陶器,在浙江河姆渡第1层(相当良渚文化早期甚或更早)出土的一件豆座上发现有刻划粗线的云雷纹,在浙江吴兴钱山漾下层的一件豆类圈足上戳印有雷纹或类似雷纹的图案,而在一件石斧上则墨绘有云雷纹。至于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刻琢有云雷纹、兽面纹的例子就更多。南方地区商周铜器上包括安吉鬲鼎上的这种富有浓郁特色的套连卷云纹和云雷纹,理所当然应该是从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这种漩涡纹、云雷纹简化、发展和演变而来。所以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不仅在社会底层广为使用的几何印纹陶器上盛行这种纹饰,在某些铜器上也必然会保留和继承这种纹饰传统,尽管在图案的形式上会有少许变异,如套连卷云纹和云雷纹的弧线上出现不一的短歧线,卷云纹的套连形式有紧有松,有宽有窄,但总的卷云和云雷的架构却基本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纹饰传统一直延用到春秋晚期甚至更晚,如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所出的铜屋模型屋面上的主体纹饰的确就是那种

套连卷云纹的变体,它是以四方连续形式出现。如果上述有关套连卷云纹和云雷纹的起源、发展、变化的论述无误的话,那西周甚或东周时期出现类似的套连卷云纹和云雷纹就不足为奇了。春秋晚期绍兴306号墓铜屋顶上的图案,就应是安吉晚商鬲鼎束颈上那种套连卷云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表明它们是同时代器物,因为安吉鬲鼎的造型和兽面纹等明显是商代晚期特点,这一总体特征应予把握。同这件鬲鼎伴出的尚有铜爵和铜案足以及玉器柄形器等,也应逐一进行具体考察,但从主体形制和带有一定地方色彩的纹饰作风看,似也都为商代晚期之物。

第四,开展南方古代青铜器研究,还必须考虑到广袤的南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其古代文化发展千差万别,在有的边远如岭南和福建地区,其早期青铜考古学文化的产生和青铜礼乐器的铸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亦经历两个不同的时段,我们既不能因发现有早期青铜文明的考古学文化,而将一些青铜礼乐器硬拉到一起,但也不能因这一地区青铜礼乐器开始铸造时间较晚而否认早期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存在,甚至把青铜礼乐器的开始铸造时间拉得很晚,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对具体青铜器进行具体分析。

以岭南地区为例,其青铜冶金术萌生的时代问题,我们不能无视岭南地区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新资料,如广东地区的浮滨类型文化和石峡中层文化以及珠江三角洲甚至香港、澳门等地发现的砂岩石范、石戈和牙璋等商周时期遗物,这些证据表明岭南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萌发阶段当亦开始较早,即有可能早到商代晚期。但由于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距中原发达的商周青铜文明中心又较遥远,因而早期青铜文明发展极为缓慢和滞后,到西周晚期前后才开始能铸造青铜礼乐器,才最后形成了自身青铜铸造业体系<sup>③</sup>。

总之,南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是一相当复杂且难度较大的课题,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关于开展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就以方法论来说也包含诸多方面,这里提出的若干思考,可能谬误很多,欢迎同仁朋友们多予赐教。

注释:

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彭适凡、许智范:《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后收入《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a.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b.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年代》,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c.李国梁:《屯溪土墩墓青铜器的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文物研究》(第十一辑),黄山书社,1998年。

a.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b.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第1期; c.张长寿:《论屯溪出土的青铜器》,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安金槐:《新干青铜器重大发现揭开江南商代考古新篇章》,《中国文物报》1990年第49期。

a.孙华:《新干大洋洲大墓年代简论》,《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b.(美)贝格立:《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干大洋洲墓的时代》,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a.彭适凡等:《关于新干大洋洲商墓年代问题的探讨》,《文物》1991年第10期; b.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

邹衡:《有关新干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0年第47期。

⑪ 高西省:《论中原地区出土的几种异形青铜兵器——兼论新干大墓的年代》,《文博》1994年第1期;《初论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三件镈》,《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⑫、⑬ (日)林已奈夫:《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刍议》,《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⑬ 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⑭ 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它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⑮ 李伯谦:《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原载《四川考古论文集》,1997年。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⑯ 李学勤:《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⑰ 何弩:《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⑱ a.南京博物院:《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b.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c.宫希成:《皖南地区土墩墓初步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⑳、㉑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㉒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㉓、㉔ 浙江安吉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第2期。

㉕ 徐长青:《江西永修发现商代青铜铙》,《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㉖ 彭适凡:《新干古玉》,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㉗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㉘ 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㉙ a.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 b.马今洪:《试论浙江安吉三官乡土墩墓出土青铜器》,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㉚ 彭适凡:《岭南地区出土青铜甬钟简论》,《青铜文化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2009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80页)

⑪ 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第1期。

⑫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⑬ a.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b.江西省博物馆等: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 c.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⑭ a.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2期; b.福建博物院:《闽侯县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